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与 文化领导权建构

杨建刚 涂荣臻

【摘要】文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党的文艺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其建构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自主探索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阶段,基于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需要,探索并建立了会议制度、组织制度、生产制度等一系列文艺制度。文艺会议制度确立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引领的基本原则与方向,文艺组织制度确保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与动员,增强了文艺界的向心力,文艺生产制度则推动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阶段对文艺性质的不同认识和文艺功能的不同定位,与时俱进地调整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与管理方法,不断推进文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通过一系列文艺制度建设,党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领导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杨建刚,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电子邮箱:yangjiangang78@163.com;涂荣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路27号(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沪),2024.1.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21&ZD256)的阶段性成果。

文艺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通过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苏联文艺制度建设经验,分别从文艺的会议制度、组织制度和生产制度等方面,夺取、确立和巩固了党在意识形态引领、组织队伍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塑造等方面的文化领导权。近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艺制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但是相关研究更多地侧重考察文艺制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对党的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关系的思考尚未深入,二者的互动对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深化作用仍有待探讨。李西建指出,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是从价值论和政治美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一次新的整合、提升和重构”(李西建121),相较于前期相关研究,在理论观照、问题聚焦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特征更加鲜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22)。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建立的

文艺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其百年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因此,回溯一百年来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研究其主要制度形态,并辨析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增强人民群众对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制度自信,也有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探索。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苏联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实践经验,都为中国共产党思考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纯粹的文艺理论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这就决定了他们并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艺”,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倡导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下思考和论述文艺问题,把文艺作为“他们为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反对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提高工人阶级革命觉悟所进行的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卢卡契 18),视文艺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争夺和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首先,在文艺的性质方面,他们把文艺视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592),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598)。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文艺的性质和功能,就成为经典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文艺批评所展开的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的颂扬,都是从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角度进行的。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二部分剩余价值理论》346),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再局限于分工的限制,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人人才能成为艺术家。其次,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并以此为阵地来争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他们反对不带任何立场的自由化写作,揭露梅林、弗莱里格拉特等人逃避政治的虚伪。巴尔扎克之所以受到他们的赞扬,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对社会历史真实的真实反映克服了他的阶级同情,实现了“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他们按照“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标准,善于从文艺作品的主题、无产阶级人物形象的塑造、工人斗争历史的描绘方式等问题入手,揭示文艺作品的阶级性和倾向性。例如,他们均认为拉萨尔笔下的济金根的悲剧性在于,他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未能也不可能同农民结盟,无法取得贵族的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进而无力推翻“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也无法实现争取城市平民和农民的支持、统一国家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511—515;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530—536)。在恩格斯看来,歌德的一些创作缺乏“较正确的美感”,其根源在于他“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面对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展现出“庸人的恐惧心理”和错误的历史观念(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256—257)。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虽然在细节、情节等方面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人物塑造的典型性,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还“不够现实主义”,是由于她止步于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没有将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之中,忽视了他们“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斗争现实,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现实主义

文学在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推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569—570)。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作为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建构文化领导权则是其核心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通过文艺争取和建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苏联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构中得到了具体实践。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对文艺的定位、文艺制度的设计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思考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并把文学艺术作为建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葛兰西和瞿秋白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列宁的影响(刘康27—33)。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34)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权问题具体到文艺工作上,就是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阐明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并注意发挥党的文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列宁认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67)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文学的党性原则,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艺制度建设确立了方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依据文艺的党性原则建立了系统的会议制度、组织制度和生产制度等文艺制度。这些

制度为苏联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建构文化领导权,以及巩固革命政权等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在会议制度方面,苏联共产党通过召开开代会和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等有关文艺工作的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等决议,确立了苏联共产党对全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同时,他们还通过文艺会议就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的创作与批评方法等问题作出指示,明确了苏联文艺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其次,在组织制度方面,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无产阶级文化专政工作(罗玲 曹葆华3)。针对苏联文艺界社团林立、各行其是的局面,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等文艺团体,成立苏联作家协会,“不仅解决了作家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指出了苏联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叶水夫267)。苏联作家协会把作家的写作上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工作者的集中领导与统一管理。这一举措,为无产阶级政党用文艺组织团结作家群体、服务新生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最后,在文艺的生产制度方面,苏联共产党通过党的刊物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俄国形式主义等对立的文艺观念和理论流派,左琴科等资产阶级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星》和《列宁格勒》等刊发资产阶级作家作品的杂志,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文艺界的指导地位。同时,苏联共产党还将文艺作品的出版纳入计划管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实现了“一般文学”向“党的文学”的转变,推动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观念、苏联的文艺制度,及其建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路径和方法,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文艺制度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样也成为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包括文艺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以苏为师”,形成了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苏联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茅盾、瞿秋白和冯雪峰等人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理论著述,为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和苏联的文艺制度,以及领导中国文艺实践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②同时,瞿秋白等人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普通民众的忽视,注重开展“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瞿秋白119)。借鉴苏联经验,中国共产党利用早期的创造社、太阳社等无产阶级文学社团,主动团结鲁迅等左翼进步作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为党全面领导文艺事业奠定了基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边区政府为文艺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而广大作家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为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提供了群众基础。二者的结合促进了左翼文学向党的文学的转型,“无产阶级文学不单在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达到马克思主义,进而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的审美标准、形式规范、基本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和各种文学样式上的开发与实验”(李洁非 杨劼18)。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借鉴苏联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经验,形成了文艺制度建设中的“苏联模式”,并实现了党从制度层面对文艺界的全面领导。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认真反思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以苏为师”的传统,开始自主探索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新路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党进行了一系列文艺制度改革,解放并激发了文艺生产活力,进一步建立了更加系统、完善、科学、符合中国国情和文艺发展规律的文艺制度。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党不断深化文艺领域的改革,努力推进文艺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着力健全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文艺批评的引领性作用。这些制度设计都为党在新形势下科学领导文艺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巩固和增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虽然党的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也存在不同的现实需要和特点,但总体而言,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而文艺会议制度、组织制度和生产制度则是其文化领导权建构中最重要的几项制度设计。

二、会议制度与文艺的意识形态引领

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会议制度是贯彻落实这一原则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定期召开会议来凝聚党内外共识,商讨和制定有利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政方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议制度。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艺座谈会、文代会、作代会等会议上,党根据各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和对文艺性质和功能的不同定位,颁布具体的文艺政策,确立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其中,通过文艺会议强化文艺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文艺会议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百年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一系列文艺会议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和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分别阐明了革命、建设、新时期和新时代不同历史阶段党对文艺的性质、价值和功能的不同理解,并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文艺会议。此次会议集中讨论“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明确了党在革

命斗争中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原则和方法。受列宁影响,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将文艺视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848,866)。《延安讲话》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性质的基本理解,通过明确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指导思想、工作对象,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突出强调无产阶级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时代主题。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延安讲话》在重申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的同时,指出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848)。这次会议明确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党性原则,阐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定位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周扬对此次会议和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延安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454)。《延安讲话》了解放区作家组织上与思想上双重入党的历史任务,促进了解放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统一。从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作党的文学,将“阶级斗争的逻辑”渗透到“艺术想象的逻辑”中(钱理群204),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树立了典范,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和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在关于国统区革命文艺的报告中指出,受制于客观环境,国统区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探索不足,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

没有很好地统一,一些作家仍存在小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主义倾向(茅盾58—64)。周扬则指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自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积极参加实际的解放战争、阶级斗争,努力反映工农兵生产斗争实践,成为“解放区文艺所以获得健康成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72)。因此,消除长期以来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的割裂状态,团结两大文艺战线,建立统一的共和国文艺,就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应当发扬解放区的文艺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70)。同时,文艺工作者应当继续坚持“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正确反映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确保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既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确立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新方向,更为1949年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次文代会开创了新时期党的文艺制度建设自主探索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已成历史,重新定位文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性质和功能成为新的现实需要。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邓小平强调,要在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工作的指导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

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213)这一论述,既借鉴了列宁提倡的“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67)的原则,保证作家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观点,又遵循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文艺不再直接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于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成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价值指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可以说,在社会主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关键历史阶段,第四次文代会的适时召开,不仅明确了党对文艺性质的全新认识和对文艺功能的重新定位,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而且为党的文艺制度建设走出“苏联模式”,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推进文艺制度改革,更加科学地领导文艺工作铺设了新道路。

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是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的新局面。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而一个国家的强大除了经济的强大之外,还应包括文化的强大,文化强国建设已然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因此,习近平首先视文艺为“经国之大业”,认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文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把文艺事业的重要性提升到文化强国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空前高度。其次,习近平强调了文艺的人民性立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宗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进行了深入阐

释,并将此作为文艺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石。习近平再次强调了文艺的人民性,并将其贯彻到创作、传播、批评和文艺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再次,习近平认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6),文艺在“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最后,习近平把党的领导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根本保障。在随后的文代会和作代会上,习近平又多次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文艺作品的政治导向,重视发挥文艺作品成风化人、培育中国精神的社会作用。显而易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擘画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蓝图,有力地提升了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治理能力,推进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开创了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3)尽管在历次文艺会议中,党对文艺的认识和定位各有侧重,但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通过文艺建构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目标是相同的。在这些会议上,领导人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并不是领导人个人文艺思想的直接表述,而是体现着党的领导集体对文艺工作的认识和定位,发挥着“以言行事”的作用(杨建刚,《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政策话语及其批评效应》115—123)。会后相关文艺政策的颁布和文艺制度的建设,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会议讲话和报告的贯彻与落实。因此,如果说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那么文艺制度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组织制度与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

组织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又一重要制度。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组织起来”不只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党参加生产克服困难的口号,而且对党的文艺组织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功的制胜法宝。在百年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多种形态的文艺组织。这些文艺组织是党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都是通过文艺组织的中介进行的。因此,科学有效的文艺组织制度,不仅可以有力地团结和领导文艺工作者,增强文艺界的向心力,也可以确保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强化党对文艺工作的科学管理,从而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制度保障。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这些文艺组织对文艺界的领导和对文艺工作的管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努力探索和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已经注意到文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界社团众多,比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等。虽然这些社团还不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尚且具有文人结社的性质,但茅盾、蒋光慈、冯雪峰等共产党人的深度参与,在推动其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泓峻 15—23)。苏联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组织制度传播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组织制度建设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参照。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分别就组织问题和宣传工作制定了决议案,不仅强调要依靠组织接近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宣传,而且明确指出中央宣传部要“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规定其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宣传

工作决议案》273)。经过党的干预和协调,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双方于1930年联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文艺组织“左联”。但此时的左翼革命文学基本上仍然延续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并未提出“让革命文学工作者知道怎样才是‘党员作家’而非‘党员+作家’”的方案(李洁非 杨劫 26)。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为了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文艺战线”,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抗战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等重要的文艺组织。^③这些文艺组织在培养党的文艺干部、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和主张、动员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革命文学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建立党领导下的全国性文艺组织积累了宝贵经验。

借鉴苏联经验,^④第一次文代会上,为统一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文艺战线,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机构。随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⑤以及文艺界的诸多相关协会和地方文艺组织相继成立。与此同时,还创立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隶属于这些机构的文艺报刊。周恩来指出,这样的组织作为党领导下的类似工会的组织,“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周恩来 24—25)。随后,作协在第二次理事会上宣布成立书记处,主要“负责处理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427)。书记处的成立使得作协作为“文艺团体”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日益突出。文联和作协建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被积极吸纳到党的文艺体制之内,成为文艺领域的“国家干部”,享受一定的工资待遇和社会福利,同时按照制度规范和组织要求进行文艺创作。为确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党在文艺领域也一定程度地采取了类似计划经济的“计划写作”的方式,作家的自由创作空间被

压缩,而写什么、怎么写、由谁来写,某种程度上都被严格规定。在创作领域,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书写革命历史,歌颂革命英雄,弘扬革命精神,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凝聚精神力量。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受苏联文艺领域内的日丹诺夫主义和以文艺批判展开思想改造的批评方式的影响,以文联和作协为代表的文艺组织开展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等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这个金字塔式的文艺组织体系采用一种类似于行政机构的科层管理体制,有效地强化了党对文艺界的全面领导,而这些文艺组织当时之所以开展诸多文艺运动,其直接目的就是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

进入新时期之后,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与更新相同步,党的文艺组织建设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改革。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协和文联等文艺组织机构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其对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导、组织与管理的职能和方式发生了适时的改革和调整。首先,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文艺体制的全面改革和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文艺组织对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管理更加灵活,市场因素日益凸显。作家的身份定位也更加多样,出现了一个由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和混合型等类型逐步演进和共存的情况(张永清 78—83)。如何更加科学地领导文艺界,团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引导和规范体制外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文艺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次,文联和作协在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文艺创作中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这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尊重,其通过文学艺术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热情也显著提高。再次,文联和作协改变了通过批判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来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

的单一方式,转而采用文艺评奖的方式,通过奖励与党的文艺事业方向相一致的优秀作品,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树立典范(杨建刚,《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建设的历程、形态与经验》41—42)。全国和地方文联、作协及相关专业协会主导的各类文艺奖项名目繁多,涵盖了文学、影视、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等各大艺术门类。^⑥这些奖项既代表了党和国家对获奖作品的正面肯定,也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相伴随,文艺领域的相关立法工作也不断推进,涵盖了文艺管理、文化市场、文化教育、文化交流、文艺团体建设等诸多方面。文联和作协也依据相应的法规及时修改工作章程,切实保障和维护了文艺工作者的各项权利,使党的文艺组织进入了更加科学的法制化管理轨道。

新时代,党和国家把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文化强国建设的空前高度。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在“团结引领文艺工作者、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习近平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2)。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准确把握文艺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与创作自由的关系的基础上,在管理范围、工作职能、行业自律等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第一,在文艺工作者的身份管理方面,将作协和文联建设成为具有包容性和向心力的“文艺工作者之家”。比如,面对网络文艺等新的文艺形态的异军突起,及时吸纳网络作家进入党的文艺组织,很多地方文联和作协也实施了签约作家、签约评论家等制度,确保他们的创作才能得到充分施展,并激励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第二,在工作职能方面,文联和作协切实改变行业机关化、行政化倾向,及时向服务型组织转变,切实提高服务能力。比如,两大组织积极开展

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讴歌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我和我的祖国”等主题实践活动与创作工程,挖掘新的文艺创作源泉。还通过实施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开办青年人才研修班等方式,有效培养了文艺青年生力军,确保文艺梯队的健康发展。同时,以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文艺组织将文艺志愿服务常态化,在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在职业道德与专业化建设方面,文联和作协努力践行行业自律的改革目标,制定《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等规章,领导方式更加全面、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们在“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服务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6—17),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四、生产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

创作和生产优秀作品是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生产制度也是党的文艺制度的重要维度。党领导下的文艺生产就是要生产出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文学”,即不仅要生产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艺术产品,而且要培育和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8)。作为党的文艺生产制度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贯穿于文艺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渗透在创作、出版、传播和文艺批评等各个环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环节的特点及其

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作用各有不同。

第一,生产“党的文学”是党的文艺生产制度的主要内容。在党的百年发展的不同阶段,“党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都利用文学启蒙民众,把文学变革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借以完成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252)不断加剧,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革命文学”取代“文学革命”成为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进步代表。在列宁的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政策的影响下,“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主导性文学观念。作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革命文学”是“党的文学”的集中体现,宣传党的思想、书写革命历程、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塑造革命主体是其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文学”的任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一次文代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和叙述革命历史,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方向。“十七年”时期诞生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是“一体化”^⑦文艺生产的典型代表,也是这一时期“党的文学”的最高成就。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书写改革历程、弘扬改革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旋律”创作成为新时期的“红色经典”和“党的文学”的主要代表。近年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成为新时代“党的文学”的重要任务。“呼应大主题、唱响主旋律”的重大题材创作、中国作协发起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文学攀登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任务所展开的文艺创作活动。

第二,出版制度是党的文艺生产制度的重要环节。胡乔木指出:“出版工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重要工作,党的各地组织,都必须把这一工作当做最重要的事情去做。”(胡乔木258)成立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就成为党的出版工作的重要方面。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对出版社的职能有明确认识,他指出:“出版社是一个企业机构,同时也是思想工作机构,同其他思想机构一样,是党用来教育人民的。它用书籍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用书籍来反映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面貌”(王任叔350)。党通过改造旧的出版行业、建立公有制出版机构逐渐统一了出版体系,为党领导和统筹文艺生产,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1949年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标志着全国出版事业适应着新的情况开始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人民日报》短评25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出版工作不仅关系到共和国文艺生产实践的总过程,也生产着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期待。在党的相关部门的直接领导和统筹下,出版机构遵循请示报告和审批、行政干预以及工作检查等工作规范(王秀涛61—65),在出版计划、出版内容和工作方式等方面进入“党的出版物”的生产轨道,全力配合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文学选集”和“现代作家选集”等丛书,在编选理念、入选标准等方面均带有继往开来、确立当代文学创作范导的考量。在这一生产秩序下,大量符合社会主义规范的文艺作品得以出版。这些作品的生产不仅塑造着社会主义的文艺传统和阅读主体,而且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憧憬与文化想象。

第三,文艺传播打通文艺工作者与受众的桥梁,而文艺期刊是其重要载体。新时期以来,文艺生产的市场化转轨逐步改变了“一体化”的生产秩序,对

文艺期刊的管理成为党领导多样化文学生产的重要写照。第四次文代会前后,文艺期刊经历了复刊和创刊的浪潮。同时,党为文艺期刊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期刊则为扶植“新时期文学”搭建了平台。伴随期刊的自负盈亏、编辑制度和稿酬制度的改革等文艺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轨,文艺期刊面临着政治、商业和文艺等多个话语场的争取。以此为契机,各大文艺期刊走向了改制、分流和转型,瞄准了各自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专业化办刊的理念和格局。与此同时,期刊对文艺的介入并未减弱。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陕军东征”“新市民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等文艺活动中,文艺期刊均为其提供了发表、宣传和讨论的平台。这些纷繁多样的文艺现象也为党对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导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新时期党对体制出版物的管理方式非常灵活,包括出台政策法规进行规约、专管文艺的机构召开会议引领方向、以领导人讲话和社论文章等形式传达官方声音、组织座谈会和评论栏目以呼应文艺政策需要、及时对负面倾向展开批评或批判等(丁帆392—399)。这些都说明,新时期以来,党对文艺期刊这一意识形态阵地极为重视,利用其时效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积极传播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培育和弘扬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价值观。

第四,文艺批评是推动文艺生产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百年来,党逐步建立了更加专业、全面的文艺批评制度,对宣传革命意识形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马克思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15)一方面,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再生产方式,本身就为文艺生产创造阅读主体,内在地构成文艺生产的

终端环节。另一方面,合理化的文艺批评也会对文化市场上脱离现实、思想滑坡、道德失范和历史虚无主义等乱象展开批判,借此引导读者提高鉴赏能力,不断产生积极正面的价值追求与文艺审美需要,为文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力。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往往被视为“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³¹),通过批判对立的意识形态来宣传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文艺批评的主要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文艺界出现了“向内转”的倾向,提倡文艺批评的“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144),更加关注文艺的审美价值和自身规律,文艺批评逐渐走向科学化和学术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浪潮席卷文艺界,市场化的触角迅速延伸到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圈子化现象日益突显,批评功能不断弱化。新时代以来,在建设文化强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任务中,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发挥文艺批评在“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倡“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9—30})。2021年,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就文艺评论的方向性、专业性与权威性、阵地建设、组织保障等问题提出要求,希望通过健康繁荣的文艺批评来进行“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⁴)。近年来,文艺评论工作如火如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中国文联在各大高校设立了两批文艺评论基地,多省作协也建立了签约评论家制度。这些都表明,充分发挥文艺评论

在精神引领和文艺生态营造中的重要作用,把好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盘”,已然成为新时代党的文艺生产制度的重要创新和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举措。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极为复杂,既有不同阶段文艺制度的发展演进,也有同一时期不同形态文艺制度之间的关联与作用。本文只是简要分析了党的文艺会议制度、组织制度和生产制度等主要制度形态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关系,对每一种制度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文化领导权建构的作用的讨论也只是摘要而论,抓住其中的部分案例加以分析,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补充和解释的地方。例如,会议制度的过渡、组织制度的演进、稿酬制度的变迁、生产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法律制度的建立等重要问题,都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密切相关,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¹⁶)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和文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指导,积极借鉴苏联文艺制度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探索并建立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制度,不仅有力推进了文艺事业的空前繁荣,也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¹⁹)从党的文化领导

权建构的角度来看,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百年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以苏为师到自主探索的发展过程。如果说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更多地受到苏联的影响,那么新时期和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和文化领导权建构,更多是党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自主探索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新时代党把文艺事业的重要性提升到文化强国建设的空前高度,文艺制度建设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话语创新(刘凯1—10),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而党的文艺制度与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命题。

注释:

①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可以视为文艺制度研究的发轫。其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就文艺制度史的研究而言,主要有: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丁帆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吴义勤主编的《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研究具体文艺制度形态的成果主要有: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李洁非和杨劼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吴俊和郭战涛的《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陈改玲的《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70年现代作家选集出版研究)》、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范国英的《新时期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中心的考察》等。

②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思想家对苏联文艺政策、制度译介的情况,可参阅庄桂成:《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李今:《苏共文艺政策和理论的翻译》,《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63。

③参见王荣:《从“组织起来”到“文艺战线”:陕甘宁文艺社团机构的建立及发展》,《大西北文学与文化》1(2020):59—

72;冯超 李继凯:《“组织起来”的革命文艺——论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2022):16—24。

④早在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之初,萧三受党的委托作为中方代表参与其中,不仅积极向苏联介绍中国的文艺发展情况,而且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介绍苏联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1949年初,丁玲出访苏联,详细咨询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有关苏联作家协会的管理情况和具体的工作经验,也影响了文联和作协的规划与建制。有关萧三在苏联的活动,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中周扬、夏衍、萧三等人的回忆文章。有关丁玲与法捷耶夫的谈话,可参阅丁玲:《与苏联作家协会法捷耶夫等谈话情况汇报》,《丁玲全集》第9卷,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362—366。

⑤1953年,二者分别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文联”和“作协”。

⑥文联、作协及相关专业协会主办的奖项主要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戏剧奖(包括梅花表演奖、曹禺剧本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美术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舞蹈荷花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

⑦洪子诚指出,当代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呈现出“一体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革命文学居于主导地位、文艺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一体化”和文学创作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方法等的趋同倾向”三个方面。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版(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87—188。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短评:《祝全国新华书店出版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袁亮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252—253。

[2] "A Brief Comment in *People's Daily*: Congratulation on the National Xinhua Bookstore Publishing Conferenc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ubli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 1. Ed. Yuan Liang. Beijing: China Book Press, 1995.252—253.]

-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3]丁帆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
- [Ding, Fan, ed. *A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Institution of China*.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20.]
- [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223—275。
- [Engels, Friedrich. "German Socialism in Verse and Prose."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8. 223-275.]
- :《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30—536。
- [---. "To Ferdinand Lassalle(18 May 1859)."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5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530-536.]
-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69—571。
- [---. "To Margaret Harkness(Early April 1888)."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69-571.]
- :《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94—601。
- [---. "Letter to Conard Schmidt(27 October 1890)."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94-601.]
- [5]《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人民日报》2021年8月3日。
- ["Five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Jointly Issued the 'Opinions'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People's Daily* 3 August 2021.]
- [6]泓峻:《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文史哲》2(2019):15—23。
- [Hong, Jun.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Community Propagation

to the Character of Early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2019): 15-23.]

[7]胡乔木:《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袁亮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245—260。

[Hu, Qiaomu. "Several Issues in Improving Publication Work (Report of Hu Qiaomu at the First National Publication Administration Conferenc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Publi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 3. Ed. Yuan Liang. Beijing: China Book Press, 1996. 245-260.]

[8]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Lenin, Vladimir Ilyich. *Two Tactics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cy Revoluti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enin*. Vol. 1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65—170。

[---.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Treatises of Lenin: On Proletarian Parti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65-170.]

[9]李洁非 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Li, Jiefei, and Yang Jie. *The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the PRC*.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1.]

[10]《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

["Literature and Art Serve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People's Daily* 26 July 1980.]

[11]李西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2):116—128。

[Li, Xijian. "General Issues and Basic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s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2022): 116-128.]

[12]刘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话语创新》,《人文杂志》8(2022):1—10。

[Liu, Kai. "Discourse Innova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8(2022): 1-10.]

[13]刘康:《瞿秋白与葛兰西——未相会的战友》,《读书》10(1995):27—33.

[Liu, Kang. "Qu Qiubai and Antonio Gramsci: Two Comrades That Never Met." *Reading* 10(1995): 27-33.]

[14]格奥尔格·卢卡契:《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弗利德里希·恩格斯》,汪建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37.

[Lukacs, György. "Friedrich Engels as a Literary Theorist and a Literary Critic." Trans. Wang Jian. *Lukács's Essays on Literature*. Vol. 1. Ed. Editorial Board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0. 1-37.]

[15]罗玲 曹葆华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俄共中央的信》,《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6.

[Luo, Ling, and Cao Baohua, trans. "On the Prolet-cult: Letter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Literary and Artistic Issues in the Soviet Un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3-6.]

[16]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45—67.

[Mao Du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Struggling and Developing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the Reactionaries: An Outline of the Report on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over the Past Decade."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of China*. Ed.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of China. Beijing: Xinhua Bookstore, 1950. 45-67.]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52—270.

[Mao, Zedong.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isting Japan(3 May 1937)."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252-27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847—879.

[---. "Speech on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May 1942)."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847-879.]

[18]卡尔·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36.

[Marx, Karl Heinrich.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36.]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88—594.

[---.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88-59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11—515.

[---.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19 April 1859)."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5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511-515.]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二部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861 to 1863, Economic Manuscript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19]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Qian, Liqun. *1948: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20]瞿秋白:《论中国文学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Qu, Qiubai. *On China's Literary Revolu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21]《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中国作家协会编。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56年。427.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retariat." *A Collection of the Reports and Speeches on the Second Council Meeting of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Endarged)*. Ed.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427.]

[22]《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249—275.

["Resolution on Propaganda Work."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 5. Ed. Archiv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 1990. 249—275.]

[23]王任叔:《王任叔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中国作家协会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350—360.

[Wang, Renshu. "Speech by Wang Renshu." *A Collection of the Reports and Speeches on the Second Council Meeting of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Enlarged)*. Ed.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6. 350—360.]

[24]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Wang, Xiutao.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

[2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Xi, Jinping. *Speech on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习近平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7月17日。

[---. "Xi Jinping'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Peoples Daily* 17 July 2019.]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lev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Ten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Report at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26]杨建刚:《中国当代文论中的政策话语及其批评效应》,《文艺争鸣》5(2020):115—123.

[Yang, Jian'gang. "Policy Discourse and Its Critical Effect in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Contention* 5(2020): 115—123.]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建设的历程、形态与经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2022):36—46.

[---. "The Course, 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2022): 36—46.]

[27]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Ye, Shuifu, ed. *A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Vol. 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4.]

[28]张永清:《改革开放30年作家身份的社会学透视》,《文学评论》1(2010):78—83.

[Zhang, Yongqin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to Writers' Identity after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terary Review* 1(2010): 78—83.]

[29]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

治报告》，《周恩来论文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26。

[Zhou, Enlai. "Political Report a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Zhou Enlai on Literature and Art*. Ed.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of Ministry of Cul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9. 12-26.]

[30]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54—469。

[Zhou, Yang. "Preface to *Marxism and Literature and Art*." *Collected Essays of Zhou Yang*.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4. 454-469.]

——：《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69—97。

[——. "New 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Report o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at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of China*. Ed.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 Workers of China. Beijing: Xinhua Bookstore, 1950. 69-97.]

——：《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29—42。

[——. "Building China's Ow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Collected Essays of Zhou Ya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0. 29-42.]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stitu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ultural Leadership

Yang Jian'gang Tu Rongzhen

Abstract: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stitution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to build cultural leadership. 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ir construction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taking the Soviet Union as a teacher" to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During the period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has explored and built a seri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ose of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institu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ferences has laid down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guidance on literary and art. The organizing institution has ensured the un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worker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trengthened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circ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productive institution has cultivated and promote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based on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PC has made timely adjustments to it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metho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as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leadership capacity and system. Through a serie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system-building activities, the Party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consolidated its cultural leadership, enriched and developed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perfected and deepened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institu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terary and art institution; Cultural leadership